学术专论

唐古忒学考

马子木

［摘要］唐古忒学为清朝培养藏语文翻译人员的专设机构。本文利用满蒙汉文史料，考察唐古忒学的设立始末与制度化历程，讨论唐古忒学生的出身、入仕、升转及其在清朝中枢藏文公文翻译中的作用，在制度设计与运作的层面上对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建与实践提供一个考察的角度。

［关键词］唐古忒学　藏文翻译　理藩院　番绎司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6）－03－0121－10

清朝作为整合中原、蒙古、西藏与新疆的大一统国家，其所需处理的行政文书涵括汉、满、蒙、藏、波斯、察合台等诸多文种，因此建立制度化的文书翻译与译员选任机制尤为重要。自太祖天命六年（1621）囊素喇嘛、白喇嘛先后定居辽阳，清朝渐以蒙古为中介而与西藏建立联系，藏文文本由是进入清代中央行政体系之中。与汉、满、蒙古文相较，清初本土藏语文译员匮乏，自顺、康以降，随着朝廷对西藏地方控制的强化，文书往来愈加频繁，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亦于乾隆朝渐次著为定例。谷岚（Fabienne Jagou）与石岩刚均曾对此有所论述①，但两文均属汉（满）藏关系史或西藏地方史的范畴，于清朝政治与制度稍显隔膜，目前尚无专论唐古忒学沿革与运作者。本文以唐古忒学的制度沿革及其运作为中心，兼及藏文行政文书的翻译、译员的出身与任用，检视制度与参与者的互动，对于理解清中叶的政治运作与制度架构或稍有裨益。需要说明的是，清廷中藏文文本如佛典、辞书等种类繁杂，本文惟取行政文书立论，余概不及。

一、唐古忒学的源起

入关之初，清廷即开始尝试培养藏文译员。顺治三年（1646），始由国子监官学生中每旗各选十人学习藏文，“俾可以蒙古语口译藏文”，但至十二年十月，因效果不佳废止，令各归原旗。②十四年重开旧例，理藩院题准“每旗各选三人学习汤（唐）古忒字义，给教习人六品

［收稿日期］2016－03－01

［作者简介］马子木（1992－），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mazimu92@163.com

① Fabienne Jagou：“In Search of the Tibetan Translators within the Manchu Empire：an Attempt to Go from the Global to the Local”，in Charles Ramble，Peter Schwieger and Alice Travers ed.：*Tibetans who Escaped the Historian's Net：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ibetan Societies*，Nepal：Vajra Books，2013，pp. 41－52. 石岩刚：《清前期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权力在西藏的推进：以〈清内阁蒙古堂档〉满文文书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 27—87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 1 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沙济达喇等题本，第 134 页。

俸”①。十八年十月，理藩院以“大国不可无谙藏文者”为由，拟派生童赴藏学习，“于藏文学童三十二人中拣选八名，随使臣同往达赖喇嘛处，学习数年，俟学成随使臣回返。所余二十四人，仍交罗卜藏格隆教习。”② 在此有必要对唐古忒学的始设年代稍加辨析。乾隆朝敕修《历代职官表》云“顺治十四年初立唐古忒学”③，《清通志》袭之。此说并不准确，若细读《会典》原文，则十四年题准仅限于越过国子监、直接由八旗内拣选生童，“教习人给六品俸”云云，亦可见并无额设之官。且如十四年已设有唐古忒学，前引十八年题本中不容不提，但仅以“藏文学童”含混称之，则并无此机构。就笔者检览所及，“唐古忒学”之名始见于康熙六年（1667），是年内秘书院以藏文翻译人员不敷，请于“八旗唐古忒学中择优者，自理藩院招取，会同彼等师傅考试录取”④。顺治十四年之说，在《会典》与档案中皆无法获得实证，恐系纂修诸臣见十四年题准之辞，遂误作初设之年。事实上，唐古忒学的设立乃是一个为时势所促的渐进过程，很难追溯到一个具体的初设年代，此本为清初制度演进的常态。

顺治朝藏文教习皆用僧人充任，如三年时为毕力格图囊素（biligtu nangsu），十八年时为罗卜藏格隆（lubdzang gelung），前者谙通蒙藏语文，初于蒙古传教，降清后还俗，并受封世职。易言之，顺治朝的藏文教习游离于清代朝廷职官体系之外，教习者有俸而无品、有事而无职，康熙朝“司业—助教”体系的确立则意味着唐古忒学职官化的第一步。司业初设于何时尚不可知，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十九日命唐古忒学司业（tanggūt tacikūi ilhi tacibure sefu）锡泰（siteo）以蒙文翻译班禅额尔德尼之藏文奏书⑤，“司业”之名始见此。助教设于康熙三十六年，是年“令六品官阿必达协同教诲唐古忒学生”，但“并非专设”⑥。由于司业、助教地位较低，很难在史籍中留下记录，笔者自《蒙古堂档》之满文翻译注记辑得历任司业、助教 7 人，亦仅知其零散的升转状况而已，具见表 1。

司业、助教官无定额，且多为兼任，其未列兼任者属专任抑或为本有而未写明，限于史料无从查考，但《历代职官表》谓“助教本以他官兼”，似近事实。就早期经历而言，班第与阿尔必特祜均出自理藩院，对边政自不陌生；桑格则在内阁有二十余年的任职经验，专司公文的流转与处理。尤需注意的是，司业的任期均较一般职官为长，如阿尔必特祜至少任职十六年，巴图赉、阿必达亦在五年以上。司业、助教的简选皆要求任职者具有相当的语言知识与行政经验，一方面可保证教授效果，另方面则能切于实用，由此便在唐古忒学教习、理藩院司员与内阁中低阶文官间形成了较为封闭的升转体系，随着唐古忒学制度化的完成，此一特点更为突出。

司业与助教代表着官僚体系对唐古忒学管理的介入，此外尚有体系外的僧侣充任实际的教习，即所谓“司业喇嘛”或“副教习喇嘛”（ilhi tacibure lama），这事实上延续了顺治年间以喇嘛教授的旧制。如丹巴色尔吉（damba serji）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前后任唐古忒学教习达喇嘛（da lama），随后又兼任札萨克喇嘛，三十六年因潜通第巴、谎称达赖喇嘛尚在，革职发遣盛

---

① 康熙朝《大清会典》卷 144，《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72 辑，文海出版社，1992 年，第 7068 页。

②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 1 册，顺治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博罗色冷等题本，第 242 页。并参见宋瞳：《清初理藩院研究：以顺治朝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03—204 页。

③ 《钦定历代职官表》卷 1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01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319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 7 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年，康熙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班布尔善等绿头牌，第 162 页。“八旗唐古忒学”蒙文原文作“aiman qosiγud-u tű̈bed bicig-ű̈n surγaγuli”。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内阁蒙古堂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 册，第 489 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3752－015，乾隆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张廷玉等题。

表 1　康熙朝唐古忒学职官表

姓名	年代	时任官职	附注	出处
锡泰（siteo）	KX22/2	司业		3－489
巴图赉（batulai）	KX28/1	司业		8－243
	KX32/6	司业兼郎中	KX37/5 尚在任	10－138；15－485
图善（tušan）	KX28/8	司业兼侍读学士		8－375
班第（bandi）	KX21/2	理藩院郎中	是否本人存疑	3－169
	KX28/8	司业		8－376
	KX28/11	司业兼侍读学士	KX34/1 尚在任	8－535；13－459
阿尔必特祜（arbithū）	KX25/2	理藩院员外郎		4－166
	KX40/10	司业	KX56/4 尚在任	12－138；MMWJ
阿必达（abida）	KX40/10	助教		12－139
	KX55/11	司业	YZ1 尚在任	19－462；21－156
桑格（sangge）	KX30/7	中书科笔帖式		11－110
	KX50/1	内阁主事		18－419
	KX55/11	助教兼内阁主事		19－461

说明："年代"以年/月表示，KX＝康熙，YZ＝雍正；"出处"为《清内阁蒙古堂档》册数－页数，MMWJ＝《御制满蒙文鉴》卷首职名。

京居住。① 古希格隆（guši gelung）、丹津格隆（dandzen gelung）曾先后任唐古忒学教习喇嘛，后者还曾任札萨克达喇嘛。② 五十九年（1719）春纂成的蒙古文《甘珠尔》总目后附纂修职名，计有"札萨克达喇嘛兼唐古忒学司业喇嘛丹巴格隆（damba gelung）、达喇嘛兼唐古忒学司业喇嘛索诺木绰尔济、唐古忒学副喇嘛罗卜藏策零格隆（lobdzang cering gelung）、唐古忒学副喇嘛扎勒藏格隆（jaldzan gelung）、唐古忒学副喇嘛丹津却达尔格隆（dandzin coidar gelung）"③ 等五人，其中索诺木绰尔济、罗卜藏策凌及丹津却达尔在雍正元年（1723）还曾参与过世宗上尊号诏书的蒙译与藏译。④

二、入藏学习的恢复与唐古忒学的定型

顺治十八年动议派遣赴藏学习的八名生童至康熙二年（1663）八月方抵达拉萨，五世达赖喇嘛先后安排白居寺堪布额尔德尼与仲孜瓦洛桑诺布为其讲授藏语文及修辞学，至四年十一月学成返京，历时五年有余。⑤ 但终康熙一朝，朝廷再未向西藏派遣学童。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理藩院方于唐古忒生童中拣选派出丰升额（fengšengge）、伍勒穆集（ulemji）至西藏，果明阿（gomingga）、那苏图（nasutu）、拉特纳（ratna）、白达色（baidese）至西宁学习藏文，皆赏给笔

①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8 册，第 375 页；第 10 册，第 53 页。革职事见《清圣祖实录》卷 184，康熙三十六年七月辛巳。

② 古希格隆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14 册，283 页；第 15 册，第 583 页。丹津格隆见《御制满蒙文鉴》卷首进呈序，《故宫珍本丛刊》本，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720 册，第 8 页。

③ 《大藏经总目录（满文）》，纂修诸臣职名，影印本《蒙古文大藏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年，甘珠尔目录册，第 141 页。

④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21 册，第 156 页。

⑤ 石岩刚：《清前期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权力在西藏的推进：以〈清内阁蒙古堂档〉满文文书为中心》，第 35—37 页。

帖式衔。① 是时七世达赖喇嘛移居泰宁，拉萨由颇罗鼐治理，与顺康之际迥异的情势或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朝廷作出如此决策，不过这已为高宗完全恢复旧制导引先路。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十五年理藩院两度派遣生童入藏学习，是后遂渐常规化，至五十年著为定制，“唐古忒学生赏给八品笔帖式衔，驰驿赴藏学习唐古忒文义，统计往返之期定限五年，期满由达赖喇嘛考试，分别等第后再行奏请更换。若所学平常，停止保题，令其再学一二年，务令学习精熟，方准更换。”② 唐古忒学学额 24 名，每旗 3 名，得以入藏者每次少则 1 人，多亦不过 6 人，乃预先考选，择优异者遣出。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四年（1834），清廷至少十二次派出“赴藏学艺”学生，其中十一次人员可考，如表 2 所示。

表 2　历年入藏学生表（1757—1834）

派出年	人名	返回年	出处
QL22	济尔噶朗图（jirgaltu）、伊鲁勒图（irultu）、达桑阿（dasangga）、爱伦阿（ailungga）		MLF03－0186－2633－020
QL35	凌云（lingyūn）、巴忠（bajung）	QL38	MLF03－0186－2633－020 MLF03－0186－2549－015
QL38	富常泰（fucangtai）、塔萨杭阿（tasahangga）	QL43	MLF03－0186－2633－020 MLF03－0188－2748－006
QL43	巴扬阿（bayangga）		MLF03－0188－2748－006
		QL52	MLF03－0192－3159－007
JQ3	爱明阿（aimingga）等六人		MLF03－0196－3589－028
JQ9	阿密泰（amitai）、宝恒（booheng）、哈丰阿（hafungga）、明耀（mingioi）	JQ13	MLF03－0198－3752－041
JQ15	纶昌（lungcang）、诺敏（nomin）、寿格（šoge）、穆克德布（mukdembu）		MLF03－0198－3791－049
JQ21	倭克精额（wekejingge）、也劳（yeleo）、音德布（yendebu）、色勒布（selebu）、佛尔果春（ferguwecun）、英麟（inglin）	JQ25	MLF03－0200－3884－011 MLF03－0200－3945－045
DG2	祜必泰（hūbitai）、永庆（yongcing）、温布（wembu）、灵秀（lingsio）、博尔恭衮（bolgonggo）	DG6	MFL03－0201－3980－001 MLF03－0202－4042－044
DG8	乌克里格图（ukligetu）、桂方（guifang）、润福（žungfu）、尧里其（ioniki）、苏布森（subusen）、成章（cengjang）	DG12	MLF03－0202－4067－023 MLF03－0202－4123－018
DG14	多特噶泰（dotgatai）、永云（iongyung）、索伦达（solunda）、舒望录（šuwanglu）、逊英（sunging）、期成（kingceng）	DG19	MLF03－0202－4147－032 MLF03－0203－4197－036

缩略语：QL＝乾隆，JQ＝嘉庆，DG＝道光；MLF＝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赴藏学员在藏期间教习与考核均由驻藏大臣与西藏宗教上层会商决定。如嘉庆三年（1798）所遣爱明阿等六人，于是年八月十九日随达赖喇嘛之年班使者同至拉萨，驻藏大臣松筠、和宁即与达赖喇嘛、济农呼图克图（jirung hūtuktu）相商，令学员驻于布达拉宫，选谙熟藏语文教习之堪布喇嘛罗卜藏索多卜（lobdzangsodb）、阿旺却喇克（awangcoirak）及通事喇嘛济农伊锡格隆（jirung isi gelung）为教习，并派毕力克图墨尔根绰尔济堪布却扎木苏（coijamsu）为总教习。③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6－2633－020，乾隆四十年六月十三日福隆安奏片。

② 托津等纂《钦定理藩院则例》通例上，《故宫珍本丛刊》第 299 册，第 116 页；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751，《理藩院二十六·仪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70 辑，第 889 页。

③《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6－3589－028，嘉庆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松筠、和宁咨呈。

如达赖喇嘛年幼不能理事，驻藏大臣则与掌管印信之僧侣商议，道光二年（1822）所遣生童至藏，时十世达赖喇嘛年方七龄，驻藏大臣文幹即行文其经师、掌印之噶勒丹席勒图萨玛迪（g'aldan sirtu samadi）呼图克图，令其妥善拣选教习。①

学员的考核与授职亦形成一套固定的体制。乾隆五十年奏定由达赖喇嘛考试，但在执行中并不尽然，如嘉庆九年（1804）所遣阿密泰等人于十三年期满，由济农呼图克图考试，道光六年（1826）的考试则由席勒图萨玛迪主持。② 与考核等第直接相关的是授职，《则例》云："列一等者以中书用，二等者以笔帖式用，均令学习行走，遇有唐古忒额设中书、笔帖式缺出坐补，留学作为教习者以助教题补。"③ 可见唐古忒学学生的出路主要有二，或分部行走，或留学任教，仍与藏语文教习或藏文公文翻译密切相关，体现出明显的专业化官僚的倾向。

在入藏学习机制逐渐固定的同时，唐古忒学的官制亦完成其制度化的过程。首先是监管大臣的出现。至迟在雍正三年（1725），滚布扎普（gumbujab）已开始担任管理唐古忒学大臣（tanggūt tacikū be kadalara amban）④，此似为差遣而非实缺，位在司业之上，凡学内出缺题补等事，俱由该员咨行理藩院，复转咨吏部办理，在拟用人员之选择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⑤ 滚布扎普虽精通汉满蒙藏语文，但时为一等台吉，本属外藩之人而非朝廷职官，于经制稍有未安，故在其卸职后遂不复设。自乾隆中叶始，理藩院堂官兼管唐古忒学渐成定制，笔者所见最早一例为伍勒穆集，其人官至理藩院左侍郎兼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乾隆三十六年（1771）八月以疾解任，奉上谕"著加恩赏给侍郎全俸，仍管唐古忒学及经咒馆事务，如有应行翻译事件，仍令翻译"⑥。嘉庆以降，则与托忒学一体由理藩院尚书兼管，如遇事繁，尚书可奏调一员协办。⑦

其次是唐古忒学职官的额缺化，康熙朝司业、助教等官皆非额定官缺，仅有俸禄，品秩、员额、职掌俱未明定。以助教为例，自康熙三十六年初设后，因首任阿必达系六品官，历任偏图、多尔济、库尔贝等人俱支六品俸，乾隆五年（1740）吏部题准，"将唐古忒学助教作为额设之缺，照满洲、蒙古助教之例，给与从七品品级，其升转之处，理藩院等衙门出身之蒙古小京官、笔帖式一体论俸升转"⑧。按乾隆《会典》，唐古忒学司业一员，正六品；助教一员，从七品；笔帖式四员，俱系蒙古缺，乾隆中叶形成的此一格局成为唐古忒学的定制，得以延续至清季。⑨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中叶理藩院昙花一现的番绎司，此司《会典》《实录》等官书不载，历来述理藩院建制者亦不及，仅见于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三十年、三十三年、四十二年《缙绅录》，有郎中、员外郎、主事、司库各一员，唐古忒学司业、助教以及部分内阁唐古忒中书亦列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201－3980－001，道光二年十月初六日文幹奏片。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0－3752－041，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玉宁、文弼折；档案号：03－0202－4042－044，道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松廷折。

③ 《钦定理藩院则例》通例上，《故宫珍本丛刊》第299册，第116页。

④ gumbujab译名有多种，汉文题本中多写作"滚布扎普"，兹从之。其官衔参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21册，第204页；其生平参见乌云毕力格：《关于清代著名蒙古文人乌珠穆沁公滚布扎卜的几点新史料》，《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在雍正三年所撰《恒河之流》跋文中，滚布扎普自属"总管学务大臣（neyite ǰaqirun surγaγči sayid-un tušiyal）"，当即此，参见乔吉校注：《恒河之流》（γanγ-a-yin urusqal），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4页。

⑤ 《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3944－010，乾隆七年三月十三日张廷玉等题。

⑥ 《清高宗实录》卷891，乾隆三十六年八月戊子。

⑦ 理藩院尚书佛尔卿额曾奏调出身托忒学之内阁侍读学士松宁协办唐古忒、托忒学事务，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8－3784－018，嘉庆十五年五月十九日佛尔卿额折。

⑧ 《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3752－015，乾隆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张廷玉等题。

⑨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3，《吏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第47页。

于此司下。[①] 番绎司的职能目前尚不清楚，同属理藩院下辖的回子官学、托忒学未被纳入其中，且考虑到清人或称藏文为“番字”（fandz hergen）[②]，或可推测，乾隆中叶朝廷希望在唐古忒学的基础上建立整合式的藏语文翻译衙署。这一尝试终告失败，很可能由于既有的制度设计足以满足日常公文转译与处理的需要，故不必费此周章。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唐古忒学中的喇嘛。以喇嘛教习藏语文是康熙朝的通例，甚至延续至雍正初，但在乾、嘉两朝文献中则无迹可寻。道光以降，朝廷再次开始在西藏僧侣中考选堪用者入京补用，现可考最早者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三月，驻藏大臣孟保会同噶勒丹席勒图萨玛迪考试布达拉宫喇嘛，选中二人与年班堪布一同进京。[③] 甚至在光绪年间，喇嘛教习已成为定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驻藏大臣裕钢咨行达赖喇嘛云“查唐古忒学设立教习二名、通事一名，来京教授诸生”，“于堪布仔仲卓尼尔翻话通事、各喇嘛内拣定”[④]，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末，理藩部仍札行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令其拣选教习喇嘛。[⑤] 根据现存史料来看，派遣生童入藏学习之最晚一例在道光十四年，此后再未见派出，就时间而言，恰与喇嘛教习的出现前后相承。两者间有何关联，后者是否在制度上取代前者，似难轻易论断，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三、唐古忒学生与清朝藏文公文的翻译

内阁、理藩院因行政之需，接触藏文公文较为频繁，转译发送，不可稍有迟滞，专设有职司翻译之官即有内阁唐古忒中书四缺、理藩院唐古忒笔帖式若干员。在地方层面，四川总督、成都将军衙门虽未设专缺，但笔帖式往往以兼通藏语文者补授。唐古忒学设立之旨本在实用，即为内外衙署输送藏文翻译人员，与翻译科举、托忒学、回子官学旨趣相通。因此，评估唐古忒学的效用宜在清朝藏文公文翻译的整体框架下展开，同时亦不可忽视对唐古忒学出身者的个案考察。

（1）升转渠道与专业化

在清朝的铨选制度中，唐古忒学生固然是一种八旗蒙古所专有的出身，与一般官学生无异；另方面，在达到一定品阶之前，其升转空间十分有限，大抵仅在理藩院或内阁专司文书处理的官职间流动。刘凤云教授将18世纪的官员划分为“政务/行政官僚”与“技术官僚”[⑥]，此一划分极具启发意义，如将“技术”不仅限于经世之“术”，则清代官僚体系中具有多语言资质的边务官员亦可称为“技术官僚”，较之治民的督抚，此一群体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且需要更为专业的技能储备，唐古忒学生无疑即是此种技术官僚的直接来源之一。

在进入个案分析前，有必要先行检视唐古忒学生入仕与升转的一般前景与预期。如前所述，学子学成后根据考试之等第，优异者用为中书、助教，其次以笔帖式补用。理藩院有额缺之唐古

---

① 乾隆二十五年冬《缙绅全本》，清华大学图书馆等编：《清代缙绅录集成》，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册，第293页；乾隆二十六年秋《缙绅全本》，同书452页；乾隆三十年春《缙绅全书》，《清代缙绅录集成》第2册，第35页；乾隆三十年冬《爵秩全本》，同书246页；乾隆三十三年秋《爵秩全本》，同书487页；乾隆四十二年秋《缙绅全书、中枢备览》，《清代缙绅录集成》第3册，第34页。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7－2647－018，乾隆四十年九月十三日军机处奏片。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204－4220－034，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二日孟保折。按，二十年十月内孟保已就此具奏请旨，奉旨准行。

④ 西藏档案馆藏档案，缩微号：612－002－5－1－（9）－50－42－hf4，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驻防办事大臣裕钢等咨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图像数据。

⑤ 西藏档案馆藏档案，缩微号：7－004－（1－2）－268－7－hf4，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理藩部为藏人教习喇嘛病故出缺需拣派喇嘛二名充任事札行达赖喇嘛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图像数据。

⑥ 刘凤云：《18世纪的“技术官僚”》，《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刘凤云：《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忒笔帖式，专以唐古忒学生考授，且补官后仍在学学习，“俟升至主事，令其离学”①。喇嘛印务处亦有额设笔帖式两员，道光十四年（1834）增设贴写笔帖式两员、学习笔帖式四员，出缺依次递补，学习笔帖式由唐古忒学生挑补，此八缺亦可视为唐古忒学之专缺。内阁唐古忒中书共四缺，按1：2：1依次由喇嘛印务笔帖式、赴藏学成之唐古忒学生、理藩院笔帖式分班轮用，实为唐古忒学专设。中书从七品，可升补理藩院主事、唐古忒司业，或转任助教。助教可升正六品的司业、理藩院主事，司业可升理藩院员外郎或太仆寺员外郎，如内阁侍读补用无人，亦可升任。② 司业、助教两缺亦为唐古忒学生专设，易言之，在内阁、理藩院衙门至少有 14 个缺位（在道光十四年前为 8 个）因其职掌的专业性而为唐古忒学生所垄断。唐古忒学学额仅有 24 个，相较于其他官学以及翻译科举，其入仕的竞争相对较小。但就另方面言之，正因对语言要求的专业性，唐古忒学生面临着狭窄与封闭的升转空间，如正七品中书升从五品侍读，本为内阁升迁捷径，但唐古忒中书并无资格；学生需升至司业或中书，前者可升员外郎，后者可外放通判、盛京六部主事，方能离开这一封闭的体系。但司业又必择精通藏文者为之，往往久任，造成仕途壅滞、升转不易。

以下择若干个案考察唐古忒学生的仕途状况。清中叶唐古忒学培养最著成效者为伍勒穆集与巴忠。伍勒穆集系蒙古正红旗人③，为雍正十一年（1733）部分恢复入藏学习后的第一批学生，乾隆七年（1742）七月由内阁唐古忒中书补授唐古忒学助教，后历任理藩院堂主事、柔远后司员外郎、理刑司郎中、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署理藩院侍郎，至三十二年二月实授理藩院左侍郎，并管理唐古忒学、经咒馆事务。④ 其人早年即以“唐古忒字话好，人去得”⑤ 著称，览其履历，除二十七至三十二年外，其余仕履皆与边务有关。乾隆十四年纂修《同文韵统》时，伍勒穆集曾与章嘉呼图克图共事，列名校译官之首⑥；至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纂修《清文翻译全藏经》时，伍勒穆集时已卸任，仍参与对校满文译文与汉藏文原文。⑦

其次是巴忠，镶红旗蒙古洪吉拉忒氏，乾隆三十五年赴藏学习，三十八年学成，以唐古忒学教习补用。四十年授唐古忒学助教，翌年迁司业。四十四年授乾清门蓝翎侍卫、三等侍卫，历任御前侍卫、副都统、内阁学士，充军机章京，五十年六月授理藩院左侍郎。五十三年七月，因廓尔喀侵扰，高宗命巴忠驻藏办事，巴忠“自恃御前侍卫，率意专擅，欲图草率完事”⑧，遂因通晓藏文之便，擅与廓尔喀议和，至五十六年七月事发，畏罪自尽。巴忠自从七品至从二品仅历七年，其中多有超擢，如以司业而授侍卫，旋即御前行走，显然出自高宗特旨。上谕谓“一切蒙古翻译、唐古忒翻译事件，俱系伊承办，且所翻尚好”⑨，其任侍卫等职，事实上“职”与“责”分离，成为御前专司藏文公文翻译之人。在处理廓尔喀纠纷时，成都将军鄂辉曾接获藏文

---

①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吏部·文选清吏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0册，第115页。

② 阿桂等纂：《钦定吏部则例》卷4，《铨选蒙古品级考》，《故宫珍本丛刊》第282册，第36—39页；锡珍等纂《钦定吏部铨选则例·满洲官员则例》卷3，《拣选·内阁中书》，《续修四库全书》第750册，第127页；同书卷5，《笔帖式·考试唐古忒笔帖式》，第190页。

③ 乾隆十三年春《缙绅新书》，《清代缙绅录集成》第1册，第136页。

④ 助教见《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3971－013，乾隆七年七月初六日张廷玉等题；堂主事见前引乾隆十三年《缙绅新书》；员外郎见《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5170－010，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十七日达尔党阿等题；郎中见乾隆二十五年冬《缙绅全本》，《清代缙绅录集成》第1册，第292页。自光禄寺卿以下升迁，见《清高宗实录》各卷，不具引。

⑤ 《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3944－010，乾隆七年三月十三日张廷玉等题。

⑥ 《钦定同文韵统》卷首，诸臣职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0册，第366页。

⑦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福隆安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编：《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9册，第227页。

⑧ 《清国史·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卷190，《巴忠列传》，中华书局，1993年，第7册，第414页。

⑨ 《清高宗实录》卷1095，四十四年十一月辛丑。

呈文，汉译后有语意不明处，遂寄送巴忠审阅，巴忠逐一改正，并自译满文进呈。①

伍勒穆集与巴忠因获高宗赏识遂致大用，诚属异数。一般唐古忒学生入仕后，往往始终迁转于特定的低阶官缺之间。如与伍勒穆集同期派出的蒙古正蓝旗人拉特纳，历任唐古忒学助教、司业、理藩院柔远后司员外郎②，后遂湮没无闻；同期之蒙古正白旗人那苏图，久任理藩院笔帖式，乾隆十二年（1747）始任内阁唐古忒中书，翌年升助教，后升司业、理藩院理刑司员外郎，三十年时仍在任，不久去世。③ 久任者如蒙古镶黄旗人诺尔布扎什，乾隆二十五年已任唐古忒学助教，三十年迁司业，至四十二年仍在任，先后近二十年皆在唐古忒学内任职。④

（2）僧侣与专职译员的消长

清朝前期藏文公文的翻译与藏语文教习的一大特色即是西藏与蒙古僧侣的广泛参与，虽然道光以降朝廷复自西藏简选喇嘛教授藏语文，但其无权参与公文的翻译，纯为边缘化的教习性质，已与清初迥然有别。僧侣与专职译员消长的枢机即在乾隆中后期，与唐古忒学制度化的完成有密切关联。

康熙朝中枢与西藏的公文往来多由驻京的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参与翻译，遇有疑难晦涩之处也需交喇嘛审校。⑤ 颁发西藏的公文，有时尚需另交京内其他寺庙如黄寺、裕亲王庙的喇嘛审阅。⑥ 这一惯例保持至雍正末年，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章嘉呼图克图颁发的满蒙藏合璧大行皇帝遗诏，其蒙、藏文便由管理唐古忒学大臣滚布扎普、唐古忒学司业诺尔普（norpu）、达喇嘛丹津却达尔（danjin coidar）、唐古忒学司业喇嘛毕力衮达赖（biligun dalai）共同翻译；九月的高宗即位诏与十二月的上谥号诏，同样由此五人译写藏文。⑦

至乾隆朝，官费资助的入藏学习机制恢复，唐古忒学内“兼管堂官—司业—助教—笔帖式”的制度架构日趋完善，学生之入仕、升转均著为定例，甚至短暂设立番绎司，凡此种种，均可视为朝廷试图将唐古忒学纳入国家职官体系的轨道之内。官进则僧退，在此情境下，喇嘛不再有任职唐古忒学的必要。就笔者检览所及，乾隆以降唐古忒学不再设立与司业平行的“司业喇嘛”或“司业达喇嘛”，因此喇嘛亦逐渐淡出中枢藏文公文的翻译与撰拟。高宗素所倚任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则属特例，其隐然幕后，成为高宗处理西藏事务的重要顾问。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高宗便曾将颁班禅额尔德尼之谕交三世章嘉翻译。⑧ 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高宗决定派遣章嘉入藏，宣谕命六世第穆呼图克图执掌西藏事务，其间一切机密文移，俱由三世章嘉亲自撰拟、翻译。⑨ 二十四年，前往里塘寻访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达尔汉格隆噶勒藏云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3－3272－008，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鄂辉折；档案号：03－0193－3272－016，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初十日巴忠折。

② 司业、助教见《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5119－016，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初五日傅恒等题；员外郎见乾隆二十五年冬《缙绅全本》，《清代缙绅录集成》第1册，第292页。

③ 《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4001－004，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张廷玉题；同全宗，档案号：02－01－03－04579－015，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三日来保等题；同全宗，档案号：02－01－03－05119－016，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初五日傅恒等题；乾隆三十年春《缙绅全书》，《清代缙绅录集成》第2册，第35页。

④ 乾隆二十五年冬《缙绅全本》，《清代缙绅录集成》，第1册，第293页；乾隆三十年春《缙绅全书》，《清代缙绅录集成》第2册，第35页；乾隆三十年冬《爵秩全本》，同书第246页；乾隆三十三年秋《爵秩全本》，同书第487页；乾隆四十二年秋《缙绅全书、中枢备览》，《清代缙绅录集成》第3册，第34页。

⑤ 石岩刚：《清前期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权力在西藏的推进：以〈清内阁蒙古堂档〉满文文书为中心》，第80页；池尻陽子：《清朝前期のチベット仏教政策：札薩克喇嘛制度の成立と展開》，東京：汲古書院，2013年，第145—146页。

⑥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8册，第6页。

⑦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21册，第204、237、275、349页。

⑧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0977－014，乾隆十五年军机处奏片。

⑨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6－1633－027.2，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章嘉呼图克图咨呈。

丹（galdzang yundan）以藏文咨呈章嘉，章嘉即翻译满文，缮写进呈。①

第二次金川战争期间，朝廷需处理大量藏文公文如咨呈、禀文、供述等等，僧侣与唐古忒学出身译员之升降，在此已见端倪。就现存的档案与官书来看，期间朝廷藏文公文的翻译主要依靠唐古忒学出身的专职译员。如三十七年，党坝土司策旺达仁之禀文由中书爱伦阿翻译②。次年，定边将军温福奏呈卓克采土司聂格尔蚌呈文，随后四川总督刘秉恬奏呈绰斯甲布土司工噶尔罗尔布禀文，两份公文俱交中书济尔噶朗图译出满、汉文。③ 爱伦阿与济尔噶朗图均为乾隆二十二年次入藏学生，僧侣已基本退出了行政文书的转译工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金川地区通行嘉绒语，而唐古忒学生皆在卫藏完成藏语文训练，翻译文牍或有窒碍，遇有难解之处，仍需仰仗三世章嘉。三十七年，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呈送藏文文牍一份，谙通藏文的伍勒穆集犹不能解，军机处遂请章嘉将全文译出。④ 类似之事又发生于三十九年正月，杂谷土司之呈文初由阿桂在军前觅人翻译，原文呈送后，又令济尔噶朗图重译，但其“于番字文义不深”，高宗“复令章嘉呼土克图另译”⑤。为便利公文转译，四十二年金川底定后，明亮进呈“番子人名地名册”两卷，高宗特命三世章嘉审阅，规范藏、满、汉三体译名，并各自写明其词义。⑥

五十一年四月，三世章嘉圆寂，是后僧侣遂基本退出中枢层面藏文公文的翻译。嘉庆以降达赖喇嘛之藏文奏书，大抵均由内阁唐古忒中书翻译。⑦

四、结语

唐古忒学之雏形可追溯至顺治初年以喇嘛教习藏语文，其初本无此机构，“唐古忒学”之名号亦迟至康熙初方出现，至康熙朝中后期逐渐形成“司业—助教”的格局，但司业与助教均非经制之缺，更有喇嘛混杂其间。自雍正以降，恢复唐古忒学生入藏学习之旧制，司业、助教、笔帖式成为额定官缺，考核、升转均形成定例，以及其在官修政书中以“唐古忒学”之名目出现，均意味着其正式纳入国家职官体系的轨道。清廷之设立唐古忒学本求实用，即为内外衙署输送藏文翻译人员。唐古忒学出身者经过入藏学习数年的训练，具有多语种的专业资质，属于清代官员群体中的“技术官僚”。清廷为唐古忒学出身者划定了特有的升转轨迹，确保其能够长期担任藏文翻译或教习工作，专缺的存在一方面使唐古忒学生较易入仕，但专缺的相对固定又使其仕途壅滞、升迁不易，除少数得到赏识而获超擢外，其余大抵沉沦下僚，终生不免译事。

唐古忒学中国家职官与僧侣阶层的关系甚为微妙。康、雍两朝唐古忒学之司业喇嘛与司业达喇嘛可与司业并列，甚至署名时可跃居其上，而康熙朝内阁蒙古堂所主导的藏文文书翻译则多有驻京喇嘛参与其间，内阁、理藩院的专职译员（如唐古忒中书、司业等）反仅居辅翼。但至乾隆中叶，双方之地位逆转，朝廷涉藏文书的撰拟与翻译主要仰赖出身唐古忒学的专职译员，僧侣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8－1818－019，无年代军机处奏片，原属二十五年四月包。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5－2502－007.2，无年代军机处奏片，原属三十七年八月至十二月包。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5－2520－047，无年代军机处奏片，原属三十八年四月包；档案号：03－0186－2571－051，无年代军机处奏片，原属乾隆三十八年九至十二月金川档包。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5－2502－006，无年代军机处奏片，原属三十七年八至十二月包。

⑤ 冯明珠主编：《金川档》，台北：沉香亭企业社，2007 年，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十八日寄信上谕，第 3 册，第 1968 页。

⑥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7－2710－018，无年代军机处奏片，原属四十二年正月包。

⑦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9－3840－069，无年代军机处奏片，原属嘉庆十九年正月包；档案号：03－0202－4032－005，无年代军机处奏片，原属道光六年三月包；档案号：03－0210－4570－024，无年代军机处奏片，原属光绪二十一年上半年包。

阶层逐渐淡出，第二次金川战争期间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参与译事，可谓清初僧侣从事公文翻译之绪余。其间缘由，一方面因乾隆初年军机处常规化后，中枢权力结构与运作过程迥异于康熙朝，僧侣无法以合法身份厕身其间①；另方面更是由于乾隆中叶唐古忒学生先后学成入仕，公文翻译原已不必过多仰赖于僧侣。

唐古忒学学生的族属亦值得关注。自顺治十八年入藏学习的八名生童以至乾隆中叶的那苏图、伍勒穆集、诺尔布扎什、巴忠等人皆为八旗蒙古，虽不能一一尽考清朝唐古忒学生的族属，但大体可以断定其中当以八旗蒙古居多。清朝之最初与南疆穆斯林接触，以蒙古语与蒙古礼为中介，南疆穆斯林对“忠诚”的表述甚至亦多借自蒙古语修辞②；至嘉道间，出身翻译科举的八旗蒙古官员，如博兴、松筠、富俊等，又成为清代中后期边务大臣的重要人选③。八旗蒙古以及内外藩蒙古在清代往往成为多语文、多族群的中介，对清代大一统王朝格局以及“同文盛治”政治文化的形成关系匪浅，其中意义或值得进一步讨论。

主要参考文献

[1] 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 年。
[2] 康熙朝《钦定大清会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 年。
[3]《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4]《钦定吏部铨选则例》,《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5]《钦定理藩院则例》,《故宫珍本丛刊》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
[6] 清华大学图书馆等编：《清代缙绅录集成》，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年。

Studies of Tanggute xue（the Qing Tibetan Official School）

MA Zimu（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azimu92@163.com）

The Tibetan Official School（Tanggute xue）in the Qing Dynasty was a special institution for training translators of Tibetan language. Based on Manchu, Mongolian and Chinese materials,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systematization of Tibetan Official School, and examines Tibetan students' origins, approaches to officialdom, promotions and their roles in translating Tibetan documents, and offers a fresh perspective on the shaping and practicing of multilingual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

① 三世章嘉在确认七世达赖喇嘛转世以及第二次金川战争期间参与公文翻译出自高宗特旨，乃跃出常规行政体系之外。此外，赵翼记“平西陲时，文书檄谕外夷，须用唐古特字，无能书者，惟降酋巴朗能之，乃令入军机处缮写”（《陔余丛考》卷 19,《造笔不始于蒙恬》，商务印书馆，1957 年，第 370 页），按巴朗乃准噶尔降人，并非僧侣，故得假军机处之名参与中枢公文的缮写。

② David Brophy:“The Junghar Mongol Legacy and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Xinji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3（2）, Dec., 2013, pp. 231–254.

③ 马子木：《论清朝翻译科举的形成与发展（1723–1850）》,《清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